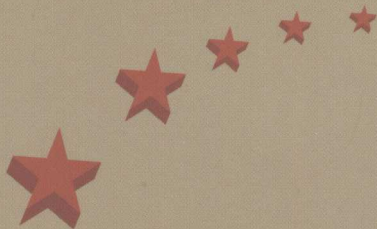




王先俊 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SANGEDAIBIAO ZHONGYAOSIXIANG
YU MAKESIZHUYI ZHONGGUOHUA



安徽人民出版社

王先俊 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SANGEDAIBIAO ZHONGYAOSIXIANG
YU MAKESIZHUYI ZHONGGUOHUA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王先俊著.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212-03100-8

I. 三… II. 王… III. ① “三个代表”思想-学习参考资料
② 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学习参考资料 IV. D261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9102 号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王先俊 著

出版发行: 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发 行 部: 0551-3533258 3533268 3533292 (传真) 邮编: 230071

组 编: 安徽师范大学编辑部 电话: 0553-3883578 388357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张: 9.25 字数: 232 千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2-03100-8

定 价: 2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
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安徽师范大学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博士点
建设基金资助项目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基本问题	8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解读	8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24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33
第二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49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社会历史条件	49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71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	88
第三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	103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主题	103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	116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	136
第四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146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历史地位的“中国化”解读	146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	151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 ...	160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的指导理论	173
第五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190
一、科学发展观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191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20
三、执政党建设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32
附 录：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评述	246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含义	246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与可能	254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及特点	261
四、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264
五、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和启示	280
六、关于怎样继续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83
主要参考文献	288
后 记	293

前 言

以政党学的视野看,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它要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同,单靠某种强制性的力量是不行的。政党存在和执政的基础,从根本上说,来自它的合法性,来自它具有足够的令人服从的权威。为了建立这种权威,政党除了对公共权力进行控制、通过不断提高工作绩效获得人们的认同等以外,还必须建立起某种意识形态的信仰体系,为社会成员提供某种价值取向,为人们对政党的服从提供理论依据和伦理依据。故尔,从一定意义上说,意识形态是政党存在和实施领导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也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党不对意识形态予以高度的关注。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由于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和有效地发挥它的指导作用。同时,具体实际是发展和变化的,所以,这种结合又不是一劳永逸的。由此,也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要想使它的意识形态真正成为它存在和实施领导的重要工具,就必须不断地调整、丰富和发展它的意识形态,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此,中国共产党人是谙知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漫长过程中,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不断地中国化,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二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内三个理论形态自身

内容的丰富和发展,这是指发生在一个理论形态内部的情况。无论哪种形式,都同样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特别是党的指导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虽然经历了许多挫折但最终仍然能从挫折中走出来,并取得辉煌的成就,不仅取得了执政地位,而且不断地巩固执政地位,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与其他的共产党不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始终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如著名学者王长江所指出的,由于这种情况的存在,这个党一建立,就面临着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任务。同时兼负这两个任务,决定了它必须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代表性,必须发挥强大的利益表达和整合功能。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自觉地把民族解放的重任担在肩上,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仅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可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在这个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就兼有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目标的三重特点。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理论——毛泽东思想,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个特点。成为执政党以后,由于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使命,就变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双重使命。为此,作为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有机统一,在自己的实践中体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得到全民族的认同和拥护。^①这种统一,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就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形成。由于建立和发展政党的意识形态对于一个政党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同和拥护,获得执政地位和巩固执政地位具有如此巨大的作用,所以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

^①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325页。

化的研究,就不仅仅具有一般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对它们的解读,实际上是对党怎样构建与发展为广大民众所认同和拥护的意识形态的解读,是对党存在和执政的理论基础和伦理依据的解读。在这个角度上,理解和把握我们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它的意义又不仅仅是现实的,而且是长远的。

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①胡锦涛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强大力量,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②这里的“理论武器”、“时代精神”、“科学理论”和“指导思想”等,表明了两层意思:一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观念形态的、精神层面的,属于前面所说的意识形态;二是它不是一般的观念、精神和意识形态,而是“指导思想”,在意识形态中处于指导的地位。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解读,就是对一种观念、精神和意识形态的解读,是对在意识形态中处于指导地位的观念、精神和意识形态的解读。这种解读,在本质上是一种对中国共产党这个群体心灵的研究,是对中国共产党心路历程的研究。这种解读和研究,必须以创造这种观念、精神和意识形态的人所留下的直接的文字等为第一位的依据。同时,任何一种观念形态都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是实践的体现和反映。所以,要真正理解和把握某一种观念、精神和意识形

①《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②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学习导读》,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态,在解读和研究的方法上,必须作社会历史的“还原”,也就是要在广阔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去探讨某种观念、精神和意识形态的形成发展、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历史地位等等。本书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采用的也是这样一种基本的方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而且是面向 21 世纪的新成果。但是,就涵盖的范围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远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广阔的多。它不仅包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样观念形态的存在,而且包括实践层面的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也就是说,它包括理论和实践两大要件,讲的是理论和实践、实践和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本书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系起来研究,不仅仅是想通过这种研究,以求得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系统认识和把握,而且想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研究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进一步探讨这一思想与当代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认识和把握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指导作用,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这是本书为什么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系起来研究的根本原因,既是本书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另一种方法,又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1989 年 6 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标志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式形成。2000 年 1 月,江泽民在《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的讲话》中,对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十多年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总结。他说:“事非经过不知难。这十年,我们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天下很不太平。”^①回顾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主

^①《江泽民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21 页。

政的十三年,事实也确实如此。十三年里,来自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的困难和风险接连不断: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海湾战争,华东水灾,“台独”分裂势力的挑衅,亚洲金融危机,长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严重洪涝灾害,美国用导弹袭击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美撞机事件,“九·一一”事件,阿富汗战争,等等。这些关系我国主权、安全和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大事件,使党和国家面临一次又一次严峻考验。去岁不远,记忆犹新。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和一系列重大事件面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依靠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方面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奋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航船沿着正确的方向破浪前进。就像江泽民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所坚定表示的:更高地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念。这个回答概括起来说,就是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不动摇,就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一句话,就是要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另一方面,也像江泽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①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当代化,由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运而生。所以,回顾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主政的十三年,我们可以看到,这十三年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实践取得巨大成就的十三年,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当代化,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十三

^①《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留给我们的巨大的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巨大贡献,理论界和学术界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肯定。同时,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正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下的一个独立的二级科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迎来了新的研究高潮。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界和学术界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丰厚的基础。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文献整理和出版工作也取得了新的成绩,编辑出版了《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人民出版社1991年和1993年版),《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人民出版社1996年、1997年和1999年版),《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人民出版社2000年、2001年和2003年版),《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和2006年版),《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教育》(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的建设(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等文献和著作。中共十六大,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深入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战略任务。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对此进行了全面部署,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决定编辑出版《江泽民文选》。《江泽民文选》共3卷、约124.5万字,收入了江泽民同志从1980年8月,特别是从1989年6月至2004年9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著作203篇。如果说,毛泽东思想及其代表作《毛泽东选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座里程碑;邓小平理论及其代表作《邓小平文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座里程碑;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代表作《江泽民文选》,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里程碑。《江泽民文选》充分展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辉煌历程和伟大成就。以上文献和著作的出版,为我们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的资料。没有这些材料,虽然不能绝对地说,这种研究是不可能的,至少可以说,这种研究可能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和永久的价值,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前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永恒的历史课题。所以,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研究,也是我们永久的历史任务。本书将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还远远不够。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本书的研究能够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有所推进。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基本问题

本书总的想法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个进程中去考察,进而揭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贡献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有必要首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等问题进行阐释,这是本书立论的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解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迄今为止,理论界和学术界对这一概念内涵的解读并不一致。这一方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身的复杂性,而另一方面这种结果则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推进。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和使用,是与“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拟将这几个概念联系起来分析,以求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内涵的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首先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两个概念提出和演变的历史过程。根据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研

究成果与接触到的有关文献资料,其情形大致如下: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来说,早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就已提出。1919年8月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就指出:“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方面去作。”^①“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不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②这里已蕴涵着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萌芽。1920年底恽代英在给刘仁静的信中说:“我们的任务,在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③1921年张太雷指出:要“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方法正确地运用于各国具体特点的基础之上”^④。1924年恽代英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⑤。1927年瞿秋白指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⑥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进一步明确。1929年在毛泽东起草的红四军党的九大的决议中,在讲到如何纠正主观主义时提出:(1)教育党员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2)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

①《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②《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③转见张静如:《关于“中国化”》,《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5期。

④《张太雷文集》(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⑤《恽代英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0页。

⑥《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0页。

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陷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①1930年由他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通篇反对教条主义,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论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②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原则的先导。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遵循这一思想原则,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上取得重大进展。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撰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这些成果代表着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也是毛泽东在哲学、政治科学、军事科学方面光辉的理论基石。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在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之前,已有了较为充分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准备。

我们在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共产国际的作用。正如鲁振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一文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的提出,经过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多年探索和思考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国际七大起到了十分明显的推动作用,使中国共产党对根据具体环境和条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加强,并为中国共产党反对这一问题上的错误倾向提供了重要武器。^③由于这样一个原因,所以在党的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是将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民族化”和“马

①《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8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③参见鲁振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

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原则必须使之具体化”的提法。共产国际七大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和各国共产党独立解决本国革命问题能力的增强,以及过去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出了改变共产国际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决定,要求各国党要“善于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问题的武器”,学会把马列主义的方法应用到各国的“具体环境中去,应用到具体条件中去”,“避免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共产国际的上述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广泛回应。在此背景下,1936年3月当时党内总负责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将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193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告全党同志书强调:“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原则必须使之具体化,成为具体行动的指南针”,中国共产党能否做到这一点,“将决定此次大革命能否胜利的命运”。^①虽然此时党的文献中还没有明确使用“中国化”这个名词,但其所提出的“民族化”和“具体化”,已经与“中国化”概念非常接近。

就“中国化”这个名词而言,张静如在《关于“中国化”》一文中提供了不少材料,以说明这个名词早期在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的使用情况。他在该文中列举了以下材料:

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编的《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中说:“要使教会学校更有效率,更加基督教化,更加中国化”。这里没有解释“中国化”是什么意思,但比较早地使用了这个名词。

1924年,《中华教育界》第8期发表了舒新城的《论道尔顿制精神答余家菊》。文中说:“此时我们所急于预备者,不在专读外国书籍,多取外国材料,而在用科学的方法,切实研究中国的情形,以求出适当之教育方法”,“使中国的教育中国化”。

1927年,庄泽宣在其著作《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中说:“现在中

^① 转见鲁振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